

▶▶▶ [上接 A2 版]

我在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的上下求索

■ 林毅夫



(4)货币中性;主流理论认为货币对经济增长没有作用,货币宽松只影响物价水平。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利率水平的高低影响企业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投资的积极性,因此,货币政策并非中性,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当然,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对企业家的一种补贴,将导致收入向企业家倾斜,而出现分配不均(Lin,work in progress)。

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也对一些现有主流理论难以解释的经济现象和争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答案。

(1) 后发优势或劣势: 经济史学家 Alexandra Gerschenkron 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有后发优势, 可以比发达国家发展更快而实现向发达国家的收敛(Gerschenkron, 1962)。然而,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经验来看,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慢, 危机不断, 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扩大了而非缩小了。杨小凯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有以技术模仿取得快速发展的可能, 而忽略了限制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的宪政改革, 最终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 因而, 有后发劣势。他认为克服后发劣势之道是先进行共和宪政改革后再去发展经济。到底发展中国家是有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 2003 年我们进行了一场辩论 (Sachs et al., 2003; 林毅夫, 2003)。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发展中国家到底有后发优势或后发劣势取决于政府的发展战略, 如果政府以因势利导的方式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消除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 则发展中国家可以靠技术引进来加速经济发展而具有后发优势。如果, 政府采用赶超战略, 则不仅放弃了利用后发优势的可能, 而且为了保护补贴赶超产业中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而扭曲各种价格信号并给予市场垄断, 结果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行为盛行, 导致经济发展速度低, 发展不可持续而有后发劣势(Lin, 2016)。

(2) 卢卡斯谜题: 主流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 资本的回报率, 资本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 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 (Robert Lucas) 发现, 在现实中资本却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 (Lucas, 1990)。对此现象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是, 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 不仅有权有势的富人从各种价格扭曲和行政干预中寻租获得的财富缺乏合法性, 从而保存在国内有一定的风险, 而且, 国内投资的资本回报率会低, 资本就会外逃到发达国家。反之,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资本的回报率高, 富人以企业家才能从市场竞争中获得的财富有合法性, 资本不仅不会外逃, 而且还会有资本流入。新结构经济学对卢卡斯谜题的这个解释在经验实证上和现实的经济现象一致(Lin and Hartley, work in progress)。资本账户开放是好是坏? 主流的金融理论主张资本账户开放, 使资本在各国间得到更好的配置。但是, 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结果是更加加剧的金融危机。新结构经济学则将资本区分为实体资本和金融资本, 外国直接投资分为发展中国家实体资本的增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而且, 为了获利大多会投资于符合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 所以, 应该开放外国直接投资。短期的金融资本的流动则通常是流向具有投机性质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带来资本泡沫, 对实体经济生产力的提高没有帮助, 而且, 当资本流动逆转时, 就会出现泡沫破灭, 以及因为期限不配套和货币不配套而发生金融危机, 所以, 对短期资本流动应该管制。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政策主张和新结构经济学的看法一致, 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必要管理短期资本的流动(Lin, 2015)。

(3) 经济开放是好是坏? 从主流理论来说经济开放有利于资源的配置, 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 著名经济学家丹尼·罗迪克 (Dani Rodrik) 发现, 多数发展中国家按华盛顿共识开放经济以后, 出现经济崩溃、停滞 (Rodrik, 2011)。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 发展中国家在开放前普遍推行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 存在了许多违反比较优势的自生能力的企业, 如果按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 这些企业无法生存, 就会出现经济崩溃, 而且, 政府对新产业的发展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就会出现发展停滞的情形。反之, 如果在开放过程中采取务实的渐进双轨转型, 给予原先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 同时, 因势利导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 则开放会带来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

(4) 发展援助是否有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了许多多边发展机构和双边发展机构, 以大量的资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 减少贫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 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深陷贫困的深渊之中, 因此, 有些学者认为发展援助无助于甚至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William, 2006; Moyo, 2009; Burnside and Dollar, 2000; Arndt et al., 2010)。新结构经济学的看法认为, 过去的发展援助没有取得效果的原因在于援助国总是以自己的经验作为参照来设计援助项目, 早期的援助试图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发达国家同样的现代化产业。后来则侧重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发达国家国家一样的现代化的市场制度。这两种努力失败后发展援助转而侧

重教育、健康等人道主义的援助。这些发展援助都不能帮助发展中国家真正实现可持续、有竞争力的产业技术结构的转型升级, 创造就业, 减少贫困。进入 21 世纪以后, 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的有偿、无偿的发展合作, 则更能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据其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来实现结构转型升级, 发展经济, 创造就业, 实现繁荣。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改变国际发展援助的思路, 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 (即其要素禀赋), 在有什么的基础上能做好什么 (即其比较优势), 帮助发展中国家克服瓶颈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为目的 (Lin and Wang, 2016; 林毅夫和王燕, 2016)。

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分析的切入点, 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分析的微观基础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初步形成于和蔡昉、李周合作, 在 1994 年于三联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 此书出版后, 获得学界一定的肯定, 张曙光老师写了一篇高度评价的书评。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了英文版外, 日本、俄罗斯、法国、韩国、越南等国的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该国的版本, 并且成了许多海外大学中国经济课程的教科书。2008 年我到世界银行工作前, 根据我在北京大学教授的中国经济专题课, 整理成书,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发展专题》, 2012 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英文版, 并改名为 Demystifying Chinese Economy (《解读中国经济》), 在国外获得了很好的评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 (James Heckman) 称: “此书在很多层面都取得了成功。它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展示了中国经济实力的两千多年来的跌宕起伏和戏剧性复兴。它有许多分析性的资源, 解读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头以及未来增长的前景。林毅夫以他富有见地的比较优势战略观点将中国注重实效的经济发展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这本书向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的信条提出了挑战, 并解释了在现实中照搬这些原理是如何对转型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杰·迈纳 (Roger Myerson) 称: “这本书探讨了中国从一个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现代经济增长的全球领导者进行巨大转变时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属于我们这一时代最为关键的问题。林毅夫是最有资格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的人。在书中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中国以及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前景的全部而重要的视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 (Edmund Phelps) 称: “这本书对中国过去的落后根源以及后来的超凡成功进行了清晰而富有见地的研究, 对任何想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来说, 这都是一部必读的著作, 一部早就应该出现的重要著作。”

我最早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一般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转型成本经验的努力是在 2001 年,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设立了以我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导师之一 D. 盖尔·约翰逊 (David Gale Johnson) 教授命名的年度讲座 (请我去做首讲, 我借此机会发表了题为“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的演讲。听了我的演讲后,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在接受芝加哥大学的校报 Chicago Maroon 采访时称, 根据林毅夫的研究“过去 15 年出现的新发展理论是无用的, ……包括许多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所做的研究是无用的”。他所说的新发展理论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非常盛行的“内生增长理论”, 这是芝加哥大学卢卡斯教授 1995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贡献之一。

2007 年, 我有幸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去做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演讲中以一个三门的数学模型来说明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战略、制度扭曲和发展绩效之间的逻辑关系, 并用 1962—1999 年间 101 个国家的跨年年度数据对各项理论推论进行检验, 这些推论都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支持。演讲的内容后来整理成书, 以《经济发展与转型: 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为题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Lin, 2008b, 2009a)。这本书总共有 5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写推荐序, 创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记录。加里·贝克尔 (Gary Becker) 写道: “林的观点是有争议的但是发人深思的。”罗伯特·福格尔 (Robert Fogel) 则说: “林不仅影响了中国政府和企业家界的思想, 而且影响了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分析。”道格拉斯·诺斯 (Douglass North) 指出: “林的马歇尔讲座不仅提供了一个难得机遇去了解东亚经济体过去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崛起, 而且, 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的标准解释投以质疑的眼光。”麦克·斯宾塞 (Michael Spence) 评价: “这是一本在多个方面来讲都是重要的书, ……他的分析以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为基础, 但是, 将其转化为自成体系的增长战略和政策, 动态机制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称赞: “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书, 解释了为何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失败。”

2012 年, 我在世界银行的工作结束前将新结构经济学有关的论文集结由世界银行出版社出了《新结构经济学: 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Policy) (Lin, 2012a)。并以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

架, 结合我在世界银行工作的经验和访问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所思所见, 于 2013 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繁荣的求索: 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The Quest for Prosperity: How Developing Economies Can Take Off) (Lin, 2012b)。此两书出版后在国外获得学界的好评。对《新结构经济学》, 麦克·斯宾塞称: “《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 ……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府制定者的重要参考, 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 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称: “世界银行一直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在这部杰出的著作中, 其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勾勒了一个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的经济路线图, ……林毅夫的观点已经激起了讨论和争辩, 这本书的贡献将确保他的观点在发展政策的反思中继续成为焦点。”对《繁荣的求索》,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 (George Akerlof) 称: “在这部著作中, 林毅夫将他研究东亚起飞中获得的智慧, 与 250 年来的经济思想编制在一起。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 在全球范围内终结贫困是可能的。不会再有别的经济学家能写出比这更优秀、更重要的作品了。”罗伯特·福格尔则称: “《繁荣的求索》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全书写作上充满热情且条理清晰, 折射出作者对全球经济议题的深刻理解。同时还提出了务实的解决方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 (Thomas Schelling) 称: “这确实是一部令人振奋的作品, ……林毅夫提出了一个令我信服的新结构经济学。”

由于我在发展和转型问题研究上的贡献, 2010 年我获选为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三、其他方面的研究

我在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史、中国文化复兴和经济学方法论等领域。

1. 新制度经济学

我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是 1986 年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在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一年博士后时开始的。当时我准备回到国内工作, 国内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改革的实质是制度的变革, 为了让自己能更好地了解改革的原因和贡献于改革的大业, 我大量阅读了当时盛行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 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心得整理了一篇题为 “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duced Change and Imposed Change” 的文章。此文 1989 年发表于《加图杂志》(Cato Journal) 的卷首。中文稿原来投给《经济研究》被拒, 后来以“论制度与制度变迁”为题发表于《中国: 改革与发展》1988 年第 4 期, 此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国内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 (Lin, 1989; 林毅夫, 1988)。这篇文章把国外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介绍到国内来, 并且把制度变迁区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 前者是由于制度背后的决定因素的变动导致制度不均衡而自发产生的变迁, 后者是由政府的主观愿望推动产生的变迁。制度有公共产品的性质, 自发的诱致性变迁常会有新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形, 政府在补足制度供给之不足上有其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 政府的强制性变迁必须有诱致性变迁的基础, 否则, 过犹不及, 不能达到制度变革所期望的效果。由于这篇文章, North Holland 出版社组织出版的经济学界最重要的工具书系列之一出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时, 邀请我和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杰弗里·纽金特 (Jeffrey Nugent) 教授合写了一章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in and Nugent, 1995)。通常只有在某个专题上被认为是素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才会得到邀请为 Handbook 写专章, 这对拿到博士学位不久的我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在这两篇文章之后, 我没有再直接写新制度经济学方面的论文, 不过, 新制度经济学是以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制度的决定和其变迁的理论, 而制度和其变迁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所以, 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对制度的决定和其变迁的许多论述也属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 所不同的是新结构经济学还研究作为经济基础影响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的产业、技术以及和制度同为影响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的决定的和韦伯疑问。

2. 李约瑟之谜和韦伯疑问

中国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在前现代社会, 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的成就曾领先于世界各国 1000 多年, 直到西方在 18

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之后中国才落后于西方国家。根据许多经济史学者的研究, 中国在 13 世纪时就具备了许多学者认为的促使英国在 18 世纪中叶爆发工业革命的各种条件, 但是, 工业革命到底没有在中国发生。李约瑟就此现象提出: 为何在工业革命前中国领先于西方, 为何到了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的谜题 (Needham, 1969)。马克思·韦伯 (Max Weber) 则发现在明朝中后期, 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 提出了为何资本主义在中国一直没有深化的疑问 (韦伯, 1997)。对于李约瑟之谜者的解释是在前现代的社会, 技术的发明以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偶然发现为主, 中国由于地理气候的条件, 自古以来人口多, 劳动者多, 技术发明的概率高于其他社会, 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成就也就领先于其他社会。到了现代社会, 技术的发明以实验室里的研发人员在科学知识的指导下进行可控制的实验取得为主, 人口的重要性下降。这种发明方式的转变是建立在 15、16 世纪科学革命的基础上, 科学革命的产生则以前天对自然现象具有好奇心的, 掌握了后天学习得来的数学和可控制实验的能力为前提。对自然现象具有先天好奇心的人通常也是具有高智商的人, 由于中国的科举制度给高智商的人提供了一条通过熟读书经参加科举考试, 进入统治阶层的高回报道路, 使那些先天具有好奇心的、高智商的人缺乏学习数学和控制实验能力的激励, 因此, 科学革命以及其后的工业革命也就无法在中国自发产生 (Lin, 1995b)。对于韦伯疑问, 我的看法则是由于工业革命在前现代没有发生于中国, 中国生产技术的资本密集度和规模增加也就不能提高, 每个企业雇用的人数难以增加,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无法产生 (林毅夫, 2007b; Lin, 2008a)。

3. 中华文化的复兴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以国家兴亡为己任, 自鸦片战争中国从天朝大国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积贫积弱国家后,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断探索救亡图强的道路, 作为文化底层的器物开始逐步上到组织和价值文化。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推动了 30 多年以学习西方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 1894 年甲午战败以后, 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推动了以学习西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君主立宪”运动和创建“共和政体”的革命, 到了“五四运动”时中国知识分子又进而认为必须学习西方的“民主、科学”精神, 甚至全盘西化, 民族才得以复兴。我认为文化的绵延不断以其核心价值的延续为依据, 五千年中华文化所以历久弥新的是在物质基础不断提升的同时, 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的传承。当一个文化体跟另外一个文化体接触的时候, 就会有先进落后、强弱势弱的差别, 其决定因素则在于经济基础的高低。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只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并随着产业技术结构的变化, 不断完善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 中国文化的经济基础的不断提高完全有可能。而且, 只要有意识地实践、倡导, 中国文化也有能力保持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取向, 21 世纪上半叶中国很有可能迎来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林毅夫, 2009; Lin, 2013)。并且,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努力的成败经验证明, 尚无照搬西方主流理论制定政策而获得成功的西方国家, 其原因在于西方主流理论总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 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 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同于发达国家, 因此, 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难免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 只有总结于中国自己成败经验现象的理论才能有助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由于发展中国家条件较为接近, 来自中国的理论创新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将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同也有助于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林毅夫, 2015)。

4. 方法论

我对方法论问题的探讨最早见于 1995 年应《经济研究》创刊 40 周年而写的祝贺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出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源于对新的经济现象的观察、总结, 每一个理论本质上都是地方性的理论, 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 最重要的国家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现象, 中国有可能在 21 世纪再度成为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经济体, 中国经济学家在观察理解中国经济现象上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 因此, 我倡导以国际经济学界通用的规范方法, 来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 并预测 21 世纪有可能迎来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 (林毅夫, 1995)。2000 年我应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邀请前去做方法论的讲座, 在讲座中我提出了用“本质特性分析法、当代横向归纳法、历史纵向归纳法、多现象综合归纳法”来观察、总结现象, 进行理论创新。这个讲座后来整理成文章以“经济学研究方法和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发展”为题发表于隔年的《经济研究》(林毅夫, 2001)。我对经济学研究方法最集中的论述是 2003 年冬在课堂上以对话的形式和学生进行的, 后来整理成书, 2005 年以《与林老师对话: 论经济学方法》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2 年分别由 Cengage 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和中文的增订版, 并改名为《本体与常无: 经济学方法论对

话》(Lin, 2012c; 林毅夫, 2012)。在书中我强调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 主张秉持现代经济学的“本体” (即理性人假说, 其内涵是一个决策者在做决策时, 在他所可能的选择方案中, 总会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方案), 以初生婴儿的双眼那样不带任何过去理论和经验的“常无”心态来观察世界, 的主流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将会是经济理论创新的金矿。

四、结语

中国自 1979 年改革开放以后取得连续 37 年的年均 9.7% 的高速增长, 其间 7 亿人摆脱贫困, 这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作为一名经济学工作者, 能够在中国改革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从事经济学的研究, 亲身观察了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社会的大变革, 乃至参与了一些改革开放政策的讨论, 实属幸运之至。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 在帮助人们认识我所观察到的现象上, 我上述介绍的理论、观点或许是可以作为值得参考的一家之言。然而, 从帮助未来的人们“改造世界”而言, 我提出的理论、观点也难免有刻舟求剑的局限, 终将被历史所扬弃, 如果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变化, 这些理论、观点还能成为现代经济发展进程上的一些陈迹则已属万幸。

我若在经济理论的发展上能留下些痕迹, 这个幸运不仅得益于大时代所给予的机会, 也是许多老师和朋友帮助的结果。我首先要感谢我在北京大学的硕士论文导师张友仁教授, 他教导了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尤其是他教了我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道理。新结构经济学从一个经济体每一时点的要素禀赋出发来探讨决定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的技术和产业的内生选择, 并进而探讨适应于产业和技术的软硬基础设施的思路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论。

我的研究也深受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舒尔茨、约翰逊、罗森、贝克尔、福格尔、赫克曼等的影响。虽然,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的观点和芝加哥学派强调“市场”的观点有所不同, 但我从那些大师们身上学会了如何从现象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来观察、总结真实世界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在我的思想观点和他们的观点有明显歧异的时候, 这些当代经济学大师们, 还以平等的姿态和我争论, 鼓励我、支持我。

我也要特别感谢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杜润生主任的信任和提携, 1987 年回国工作杜主任任命我这样一位出生在台湾、长大在台湾, 又非党员的年轻学者为其下属的发展研究所的副所长, 这个工作让我有机会参与了中央的许多政策讨论, 并且从近距离接触杜老以及和他同一辈的领导中让我了解到许多政治领袖参加革命, 制定政策推动变革, 追求的并非像国外盛行的政治经济学文献所描述的是为了个人所属利益集团的利益, 而是为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盛不惜舍弃个人、家庭和所属利益集团的利益。

在发展研究所工作期间以及 1993 年以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学任职时, 和许多同事的切磋则让我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我在 1994 年出版的《中国的奇迹》一书得益于和蔡昉、李周的合作。2001 年的 D. 盖尔·约翰逊年度讲座和 2007 年的马歇尔讲座中的观点得益于巫和懋、霍德明、朱家祥老师所组织的发展组会议的讨论, 理论建模和实证检验则得到刘明兴、张鹏飞、刘培林、陈斌开、徐朝阳的帮助。和鞠建东、王勇的合作则使得从要素禀赋结构出发来内生产业结构的努力得以实现。

另外, 和我合作写过或正在合作写论文的经济学家, 徐佳君、付才辉、陈明富、姚涛、余森发、赵耀辉、徐晋涛、陈嵩、龚刚、龚强、杨森、龚自圣、刘志坚、文贤中、文一、王鹏飞、王燕、张一林、Celestin Monga、Volker Treichel、Hinh Dinh、Will Martin、David Rosenblatt、Doerte Doernerland、Vandana Chandra 等为我的理论的完善和实证做了许多的工作。我在北京大学所带的其他硕士、博士生, 博士中, 胡书东、皮建标、陈岗、盛柳刚、邢兆博、孙希芳、潘士远、姜烨、李志贤、李飞跃、邢亦青、章奇、程协南、周浩、陶然等也都从教学相长中让我获益良多。

社会是不断在进步的, 我的研究工作也应该以“常无”的心态, 探索各种不断出现的新现象、新挑战, 以深化、丰富乃至发现我提出的理论和观点。如果上天再假我以三十年, 我愿意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和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各位老师、同事、同学, 以及国内、国外经济学界的诸位学友一起相互勉励, 继续为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以及为用理论来改造世界以贡献于中国梦的实现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繁荣而不懈努力, 乘风破浪前进!

(转自《经济学季刊》2018 年第 2 期)